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2 期（总第 350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19 年 2 月 5 日

-
- ◆ 农桑为本，本固邦宁.....郭书田（1）
 - ◆ 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居全球领先地位.....朱丕荣（3）
 - ◆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重点在哪里.....张晓山（5）
 - ◆ 改革四十年对乡镇企业的回顾.....张 毅（7）
 - ◆ 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丁玉华（9）
 - ◆ “农民协会”轶事.....赵树凯（12）
 - ◆ 小农户如何对接现代农业.....李朝民（18）
 - ◆ 八论践行“三农”必须强、富、美.....李毓堂（20）
 - ◆ 纪念改开四十周年，应该记住这些早醒先行的小人物.....李克军（24）
 - ◆ 2018 年：历史性的拐点—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易富贤 苏 剑（29）

农桑为本，本固邦宁

——在中国林产工业协会桑产业分会成立会上的发言

郭书田

桑产业分会成立，既是一件大事，又是一件喜事。作为农业战线的一名老兵，对桑产业分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再祝贺！同时，也转达农业的前辈 103 岁的石山同志对桑产业分会的成立，表示高兴与祝贺！他主张“林草兴邦”，被誉为林草派之首。他十分关注任荣荣同志长期研究与开发桑产业取得的重要成果，并给与高度评价与积极支持。

桑树属于桑科与桑属（*Marus*），品种繁多，为人所共知。森林是地球生态平衡、人类赖以生存、调节气候、美化环境等最大的生物物种资源。中国从寒温带赤道热带，是拥有树种基因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简要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业发展的历史及经验，对于发展农桑产业会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了两个有关林业的部，一个是林业部，部长是著名森林学家梁希，是个种树的部，主要任务是植树造林，增加森林覆盖率，满足用材的需要，以发展用材林为主，形成树种的单一，被认为是北方的“杨家将”，以杨树为主；南方的“杉家浜”，以杉树为主，对经济林与生态林有所忽视，造成林业内部树种的失衡。第二个是森林工业部，部长是民盟的罗隆基，主要任务是满足工业化对木材及其加工品的需要，人们认为是个“砍树”的部，特别是大量砍伐原始林区的树木，造成严重的生态失衡，这个部后来被撤销。尤其是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失误中，为了发展粮食作物，大面积毁林开荒与毁草开荒，使林草覆盖率大幅下降，造成荒漠化、水土流失以及气候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使绿水青山变为秃岭荒山等严重后果。在改革开放以后，调整了政策，退耕还林及退耕还草，使林草覆盖率逐年有所上升，荒漠化与水土流失面积有所减少，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是，由于生态失衡欠债太大，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尚未根本好转。经济贫困实际是生态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大力发展林业和草业，生态环境恶化状况有了很大改善，逐渐走上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优化良性循环的轨道。

我国种桑养蚕已有 5000 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省夏津县黄河故道植桑有 2000 多年历史，在苏留庄镇存有 6000 亩古桑园，拥有百年以上古桑树 2 万多株，是现存树龄最高的桑树群，已被我国与联合国列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三字经》中说：“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知物”，在古代出口的四大产品（蚕丝、茶叶、陶瓷、猪鬃）中居十分重要的地位。汉张骞骑着骆驼

带着丝绸出使西域，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并从西域引进紫花苜蓿与阿拉伯马，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受到汉武帝刘邦的高度赞扬。南宋诗人陆游有诗：“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石山同志有感而发，赋诗一首：“引进紫花思汉武，开创草业赖钱公（注：指钱学森提出立草为业）新思灌丛承勋业，草原定将振雄风”。他的真知灼见正在成为现实。林以草为伴，草以林为根，林草兴邦正为人民群众的认知，成为发展可持续农业的自觉行动。

桑树在林木当中具有独特的多种功能，全身都是宝，除了养蚕带动丝绸工业的发展之外，还有强大的生态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由于根系特别发达，具有强大的抗逆性，能在荒漠地、盐碱地、涝洼地等不毛之地生长良好。任荣荣同志培育的高蛋白优质新品种饲料桑，在三峡库区消落地种植成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把有害之地变为有利的良田，这是一个重大的创造，为发展畜牧业开辟了木本饲料之新源，可大大缓解以粮食作为主要饲料的压力，为减少粮食大量进口，确保粮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这一成果受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的高度赞扬，并指出由于有关部门的重视不够，推广不力，但一经与广大农民见面，就能被接受。饲料桑作为木本饲料，与木本粮食、木本油料形成三位一体的木本经济体系。相信桑产业分会的建立，必将为使这一成果扩大覆盖面发挥积极作用。

“沧海桑田”是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淮南子》说：“事故人君，上因天时，下尽地力，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逐长五谷，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桑麻”。

桑叶、桑枝、桑花、桑椹（即桑果）均具有药用价值，又有食用价值，系药食同源，特别是桑椹，含有多种维生素，能够强身健体。这是发展桑产业的重要项目，开发潜力甚大。

桑树有为人造福的高尚品格，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桑树常与梓树（属紫薇科，学名为 *Catlpao vata*）梓树在乡村农民庭院中种植，成为人们怀念家乡的象征。张衡在《南都赋》中说：“永世克孝，惟桑梓焉。”《诗·小雅》中说：“惟桑与梓，必恭敬止”。在建设美丽乡村与发展乡村旅游业中，发挥桑梓文化，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能够发挥良好的教育作用。

在新时代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中，把桑产业列入“大农业走出去”项目，促进与亚非国家的文化交流，增强友好合作，也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桑产业是中国立国之本，本固邦宁。发展桑产业既古老又现代，贵在人才，需要培养与造就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建议桑产业分会与中国林业大学合作，把培养桑产业专业人才列入教育项目。发展现代桑产业需要形成桑产业的一二三产融为一体的利益新机制，引进新的高科技，加强与有关科技部门合作，把桑产业作为调整和优化大农业与林业树种供给侧结构的重大项目，满足人们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为实现强国富民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努力，取得新成就，作出新贡献！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2018年5月20日）

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居全球领先地位

朱丕荣

联合国粮食组织于 2002 年发起创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倡议，目的是要推动全球优秀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推广与可持续发展，以造福于人民。并提出了凡是入选遗产，需要备五项标准：即能保障食物和生计安全；拥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体现农业知识体系和技艺；含有农业文化与精神体系；具有自然景观和水土利用系统等特点。

我国是最早参加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的国家之一。2005 年经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就首批成功入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这一项目，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曾批示过，要求“勿使其失传”。到 2018 年 5 月止，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确定的共 20 个国家 50 项遗产中，我国已拥有 15 项，数量居世界各国之首位。

中国的名录如下：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陕西佳县古枣园、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文化系统、福建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等 15 项。

我国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管理、科技支撑和国际交流居领先地位。农业部先一步成立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加强制度建设，并在全球第一个发布国家级管理办法。组织推动遗产所在地政府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在中国农学会成立农业文化遗产学会，组织带动 20 多家高校与科研机构参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监测、评估、保护交流等工作。农业部于 2012 年就启动了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工作。迄今已认定了 91 个国内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我国注意发挥遗产作用，增强乡村发展活力。中国农业历史悠久，勤劳农民在长期实践中，因地制宜善于合理利用土、水、生物、气候资源，有效发挥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创造丰富的经验与智慧，应当继承发扬推广。浙江青田已培育出稻鱼共生的生态大米，青田田鱼等品牌，并扩大稻鱼技术。内蒙古敖汉旗先发展敖汉小米特产品牌，收集当地农家品种研究提高。福建茉莉花茶产业日趋兴旺发达；浙江绍兴香榧产

业扩展，增加农民收入。江西万年开展水稻传统品种提纯复壮工作。

积极开展遗产的宣传推介活动。支持中央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意大利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分别拍摄了《农业遗产的启示》、《美丽中国》、《天人合一》、《红河哈尼梯田地区特色饮食文化》等农耕文化题材的纪录片，扩大社会影响。

加强国际交流，提升中国农业国际声誉。农业部推荐中国科学院李文华院士和闵庆文研究员多次担任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委员会议事机构的主席，主持起草了各项规则标准的制定，同时派遣三位年轻官员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处任职，参与全球农业遗产发展规划。此外积极利用国际舞台输出中国遗产保护理念。如利用世博会、全国农业现场交流会等平台展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面貌、发展经验。特色产品。还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项目，吸引 60 多个国家农业官员来华学习遗产工作经验。还推动农业遗产走出去。如“福州福建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与法国勃艮第葡萄园、“江苏兴化垛田农业系统”与墨西哥城浮田系统等先后签署了合作协议。

从全球入选的 20 个国家 50 个项目看，以亚洲国家居多。除中国 15 个外，其他国家项目介绍如下：日本 11 个（能登半岛山地与沿海乡村景观、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熊本阿苏可持续草地农业系统、静冈传统茶—草复合系统、大分国东半岛林—农—渔复合系统、岐阜长良川流域渔业系统、和歌山青梅种植系统、宫崎山地农林复合系统、大崎可持续稻作生产的传统水资源管理系统、西粟仓山地陡坡农作系统、静冈传统芥末栽培系统）；印度 3 个（藏红花农业系统、科拉普特传统农业系统和喀拉拉邦库塔纳德海平面下农耕文化系统）；韩国 3 个（青山岛板石梯田农作系统、济州岛石墙农业系统、河东郡传统茶农业系统）；坦桑尼亚 2 个（马赛游牧系统和基哈巴农林复合系统）；西班牙 2 个（拉阿哈基亚葡萄干生产系统和阿尼亚纳海盐生产系统）；秘鲁的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智利的智鲁岛屿农业系统；阿尔及利亚埃尔韦德绿洲农业系统；菲律宾伊富高稻作梯田系统；突尼斯加法萨绿洲农业系统；肯尼亚的马赛草原游牧系统；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绿洲农业系统；伊朗喀山坎儿井灌溉系统；孟加拉国浮田农作系统；阿联酋艾尔与里瓦绿洲枣椰种植系统；埃及锡瓦绿洲椰枣生产系统；斯里兰卡干旱地区梯级池塘—村庄系统；墨西哥传统架田农作系统；葡萄牙巴罗索农林牧系统。

【注】：

根据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国际处赵立军处长提供有关资料摘要整理，特向赵处长致谢。

（作者：原农业部国际合作司长，2018 年 12 月）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重点在哪里

张晓山

一、政策不断演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农业、农村的发展与工业及城市的发展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尽快建立完备的国家工业体系，国家通过征收农业税与工农产品“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积累，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通过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为国有的方式，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土地及资金支持；亿万农民工进城务工，为加速城市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上个世纪90年代，在家庭承包经营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夯实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之后，农业、农村发展遇到了瓶颈。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挑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加大，农民负担加重、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公共支出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农村广大的、潜在的市场仍然难以成为现实的市场，启动内需仍步履维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变革迟缓，城乡资源配置存在着诸多弊端，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重视往往还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中。

进入21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此后，中央明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

从2004年起，中央连续发布多个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报告提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先序，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些政策举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深化宏观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农村发展

农村改革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不在农业和农村本身，而在整个宏观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农村改革能否进一步深化和取得成功，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能否深化、能否破除既得利益的藩篱密切相关。必须把深化农村改革和深化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相结合，更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协调“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的上级层次与基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曲的局面，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同时使政府资金的投放更为制度化、规范化和透明化。

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要素市场化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将在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的大战略中处于关键性的位置。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就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也就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农业转移人口加速市民化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过程。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里面讲到拓宽资金筹集渠道，调整完善土地出让使用范围，提出：“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所得收益通过支出预算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土地政策的重大调整。

2018年4月18日，财政部公布一季度财政收入数据，其中一季度土地出让收入延续了去年的高增长。以往的相关政策之所以严格限制土地整治后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跨省（市、区）流转，是为了遏制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推行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冲动。同时也因为地方政府得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主要用于城市和园区建设，返还给农业和农村的份额很少。2018年2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农办负责同志指出：“长期以来，土地出让收益，可以说是‘取之于乡，用之于城’，直接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是比较低的。”

这次政策允许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能够跨省域调节，同时提出要把所得的收益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这样一些具有约束性的政策制度规定，拓展了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的领域和范围，使增减挂钩的节余指标价值量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了所得收益的用途，使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能够具有一个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四、颁布农村改革相关文件，释放改革红利

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进程中，法律的规范往往滞后于改革的实践。在改革之初，百废待兴，改革常常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各类规范性文件的发布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体系基本确立，但中国仍然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形态仍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些确立的法律条款跟不上改革实践的步伐，而法律的修订完善又不可能与时俱进，需要相当长的过程，这就造成了改革实践与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

例如，《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这就使农民无法有效利用自己作为集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土地资源。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允许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采取入股、联营等方式，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严禁违法违规开发房地产或建私人庄园会所。”

当法律的修订还没有跟上改革的步伐时，中央通过重要文件的发布对地方的探索从政策上提供了依据，释放出改革的红利。

五、明确政府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中的责任

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的作用，要素总是向生产率高、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要采取综合措施，提高农业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促使要素向这些地区和产业流动，尽快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如果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时要注重效率，那么在国民收入再分配时就要注重公平和正义。政府要承担起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主体责任，通过财税政策的调整，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人均享有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政府在这方面有责任，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荣誉院士）

改革四十年对乡镇企业的回顾

——在农业部离退休干部局召开纪念农村改革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张 毅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大国、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多的大国。面对这个现实，他是我国政府执政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三大问题，我们党费尽了心思，探索我们应走的道路。

在我国发展乡镇企业，就是一个探索。我国发展乡镇企业，起于 1958 年，先后叫农业社办工业、社办企业、社队企业、乡镇企业、一二三产业融合。我这里就统一叫乡镇企业发展。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 1957 年到 1979 年，“为理想”而发展的社队企业。

1957 年毛主席到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会上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商定：以美英两国工业为目标，苏联赶超美国，中国赶超英国。1958 年 1 月在南宁会上，为了在工业上赶超英国，毛主席要各省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但当时各省都没有地方工业，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今后除中央办工业外，各省、地、县、乡、农业社都可办工业；3 月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决定》，要求 1958 年工业产值要比 1957 年增长 33%，从此开始了农民办企业的起点。1958 春，陈伯达对毛主席说，马克思曾说过，农民既种田又做工，这种形式就是人民公社。随后中央一些领导在广州议论建立人民公社、争取在贫穷时就过渡到共产主义，即所谓“穷过渡”。人民公社成立后，通过“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大办社办工业，“大锅饭”，“吃饭不要钱”等，毛主席说“我们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郑州会议发现“两股风”过于严重，提出要“破产还债”，公社不办企业，交大队办，于是才有社队企业这一名称，到 1959 年中央文件决定公社、大队都不办企业，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种靠主观意志，不按国情决策办事，使国家和农民吃尽了苦头，犯了颠覆性错误。

二是 1979 年到 2012 年，从国情和农民需求出发，恢复发展社队企业。

1975 年中央决定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浙江财贸口几个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社队企业在农村对发展农村经济多么需要，但有中央“红头文件”不许发展，形成基层不敢发展、部门不敢过问、不敢支持的现象，请主席关照一下。毛主席批给邓小平，邓小平印发政治局各领导同志，华国锋代表中央在农业学大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今后要发展社队企业；会后国务院批准农林部成立社队企业局，抓这项工作。1979 年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则通过《加快发展农业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所有这些，虽有“红头文件”，给社队企业“正了名”，但有关部门不给“上户口”，没有人财物指标，让在计划经济夹缝中求生存，从事乡镇企业的同志说：“我们是后娘养的”。

为了解决全国人民能有饭吃而且能吃饱、解决国内物资缺乏、解决农村剩余劳力就业问题，农民将这三大任务一肩扛，既务工又务农，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全国人吃饭问题；为了解决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出现数亿剩余劳动力，当时国家政策不许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在国家不投资、不贷款情况下，在本村、本社办起乡镇企业，安置了农村剩余劳力，还缓解了国家物质供不应求的困境。我国乡镇企业在这困难条件下、在杂音干扰下，由于有中央和领导同志支持，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到1997年乡镇企业已发展到215万个，占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1.3亿，比国营企业职工还多5000万人；乡镇企业增加值2.1万亿元，占全国GDP的28%；乡镇工业增加值1.5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47%，几乎半壁江山；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75%；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总额按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增加收入613元，占到全年收入的30%；1978年到2007年仅上缴国家税金就有4.4万亿元。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邓小平的肯定，称他为“异军突起”。但不知因何原因，从2012年乡镇企业就无声无息，再也不提了，乡镇企业各级领导机构也消失了。

三是2018年至今，在进入新时代，为了“富裕”农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理想，提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根据中国现状和历史经验，结合“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从人民需要出发”、“一切由人民满意不满意来检验我们的工作”。他提出“要振兴农村”，“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消灭农村贫困人口”，“农村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到2017年全国民营企业已达2700万家，有许多就是原来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6500万户，绝大多数是农民专业经营或兼业经营的。据乡村产业司资料：2017年农产品加工产值22万亿元；农村旅游28亿人次，营业收入7000亿元；农村电商收入1.25万亿元。最近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对我国民营企业作了很高评价，他说：“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他还说：“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制度。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主体”。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削弱，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作者：原农业部乡镇企业副局长，2018年11月22日）

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心得笔记

丁玉华

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2018年12月18日，又是一个载入历史的重要时刻，更是一个开启历史的重要节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大会，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深情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的光辉里程，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明确提出了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目标要求。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对于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乘势而上再创更大奇迹。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把《讲话》概括为“一次觉醒”、“三大里程碑”、“十方面回顾”、“九条经验”、“一声号召”，便于理解和记忆。

“一次觉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1978年，党和国家正在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正是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4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觉醒，催生了改革开放的壮阔大潮。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改革开放拉开了时代的大幕，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启了伟大征程。

三大里程碑。习近平同志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作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

人民用 28 年时间彻底改变了 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

十方面回顾，即《讲话》中“十个始终坚持”取得的伟大成就。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

40 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3679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82.7 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 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2.9%左右的年均增速。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日益完善。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71 元增加到 2.6 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7.4 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 94.4 个百分点。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保护和节约资源，坚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节能减排取得重大进展，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进人民军队实现革命性重塑。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相继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和主动权。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积极应对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党面临的各种风险考验，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40 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

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就要深刻把握我们以“十个始终坚持”取得的伟大成就。40年风雨同舟，40年披荆斩棘，40年砥砺前行，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对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用“十个始终坚持”高度概括了党引领亿万人民的奋斗里程和创造的人间奇迹。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九条经验。第一，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第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第四，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五，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第六，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第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八，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第九，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善于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也是我们党推动工作的制胜法宝。

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就要深刻把握“九个必须坚持”的宝贵经验。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用“九个必须坚持”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这“九个必须坚持”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声号召：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在近代以来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进行了太多太多的拼搏。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作者：原农业部离退休干部局长、高级经济师，2018年12月24日）

“农民协会”轶事

赵树凯

1980年，在全国建立农民协会，作为新的工作重点，被提上国家农委工作议程。改革开放40年以来，人们对于农民协会的态度基本一致，均认为农民应该有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应该成立。然而时至今日，全国性的农民协会也未能成功建立。本文梳理了关于成立农民协会问题的始末。

1980年春天，在围绕包产到户的政策争议呈胶着状态同时，农民协会问题被九号院提上了高层政策议程。四十多年来，农民协会问题虽然持续受到朝野高度关注，但这是唯一一次正式提上政策议程。建议筹备成立全国性农民协会，是九号院里的国家农委正式提出的。与包产到户的政策命运相反，农民协会刚进入政策议程即遭搁置。在杜润生出版的农村改革著述中，颇多谈及农民协会事，但未系统叙述，本文略作梳理。

一、1980年农委工作重点

1979年2月，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根据中央要求，农委设定了1979年的工作重点，主要有：部署落实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组织全国农业自然资源普查分析、开展农业现代化试点、重新布局全国的商品粮基地、推进农工商综合发展、推动农民教育工作和农业干部培训等。进入1979年下半年，推动在全国建立农民协会，作为新的工作重点，被提上国家农委工作议程。

建立农民协会问题，在高层突然提出，个中原委不甚清楚。从农委会议资料来看，由副总理王任重直接安排，由主持农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任亲自操办。

国家农委推动建立农民协会，工作抓得很紧，工作节奏很快，议程初始设置即相当高端。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王任重召集部分与会中央委员座谈，重点是征求意见分管农村工作省市和部门领导，讨论建立农民协会问题。与会中央委员、省委领导人大都认为，原有的“贫下中农协会”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应当探索建立新的全国性农民组织即农民协会。

这里所谓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是当时农村中以阶级成分作为标准成立的农民组织，即贫农和下中农的共同组织。当时农村中的阶级划分，主要有主要有五种，即贫农、下中农、中农、地主、富农。文化革命中，贫协的主要作用，是管制、监督、改造、教育地主和富农。地主、富农摘帽以后，贫协如何处理，王任重曾经口头向华国锋汇报。华国锋表示，地主、富农摘帽的同时，撤销贫下中农协会不妥，应该考虑新的农民组织。

1979年12月上旬，国家农委在天津召开全国农民教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是各省（市、区）农委负责人，也邀请了一些地县教育部门负责人。会前，王任重指示，利用这次会议机会，把有关省（市）“贫协”负责人也请来，一起讨论成立新的农民协会问题。当时，文革结束后，有些省陆续撤销了贫下中农协会，还有十

五个省有贫下中农协会。在分管科教农的农委副主任何康主持下，座谈会开了一周。

12月4日，会议结束前两天，张平化从北京赶来，召集十五个省贫协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贫协是否保留，是否成立新的农民协会。从会议记录来看，所有发言者都积极赞成把贫协转变为农协，认为建立各级农民协会，特别是中央层面建立全国性农民协会组织，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迫切性。

座谈会结束时张平化讲话：“农委认为，成立农民协会是一件大事，曾多次征求意见。昨天，王任重同志招致农口各个部长开会，还谈到此事。我们一有机会，就找一些同志座谈，或个别交谈。在四中全会召开期间，曾召集部分中央委员座谈。今天的座谈，内容生动丰富，比上次更具体，道理说得更清楚。同志们的主张完全一致，就是办农协。全国性农民协会办起来以后，贫下中农起骨干作用。与此同时，贫协完成历史任务，即不必要单独成立贫下中农协会，这样可以更好地调动农民积极性。”“这次会议比上次更加明确了迫切性。是时候了，应该及时解决问题，很多同志讲越快越好，拖不得，越拖越受损失，确实不应该再拖下去。现在已经在农民中，首先是在贫下中农中，产生了很多意见，不理解，不满意，也存在不满情绪。”

在这次讲话中，张平化委婉地批评了一些省撤销贫协：“中央31号文件，指出‘贫协不动为宜’，是针对有些地方要撤销而写的。这句话不是要撤，是不撤，实质上是主张不撤销。如果撤销了，道理上讲不通。这是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能那么轻率地撤销。”张平化还鼓励那些贫协负责人继续做好工作：“中央不赞成撤销现有的贫协，中央不会宣布撤销，不会否定贫下中农集会结社。这是广大贫下中农在党领导下搞四化建设的需要。十几个省协会还存在，要自己开展工作，挺起腰杆干工作。只要中央不撤销，就积极发挥作用。要积极工作，不要消极等待，更不赞成关门走人。”张平化最后说：“从我们了解情况看，成立农民协会，要决断，越快越好。但是，国家农委无权决定。决断要有中央，我们要及时反映情况和意见。”

二、张平化的阐述

12月6日下午，张平化在全国农民教育座谈会上作大会总结讲话。张平化的总结讲话，只是在开头部分讲了农民教育的问题，3/4以上的篇幅是讲农民协会的成立。关于农民教育，张平化在总结讲话中表扬了一些基层单位，不但要扫除旧文盲，还有杜绝新文盲，普及五年小学要下大力气。这一步迈不开，普及初中高中就没有基础。然后，张平化将话题转向农民协会问题。这个大会讲话，是张平化作为主持农委工作的第一副主任，对于农民协会问题的再次阐述。

张平化说：“这次座谈会整整两天，参加会议的同志，每个人都发言了，一致主张成立农民协会，名称也一致，或者简称农会，也就是农民协会。主张要有全国的组织，也是个一致的意见，把牌子挂到北京，有同志建议叫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没有一个不赞成的。比上次讨论更加一致，更加具体而生动。成立农民协会，不但有重要性，而且有迫切性，迫切性更加讲得尖锐突出。”“为什么？重要道理很多，从大的方面来讲：中国有9亿人民8亿农民，各方面都有群众自己的组织，占人口80%的农民为什么不能有呢！工人阶级有工会，青年有团，妇女有妇联，科学有各种协会，文化系统有各种协会，文学戏剧等十几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政治协商，儿童也有组织。如果80%的人民没有自己的组织，说不出一条道理！”

在这次讲话中，张平化结合他本人经历，谈到农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说明农民组织的重要性。他说：“1927年初，北伐军到武汉，我参加了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那时，毛主席刚从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回到武汉，首先在武汉办讲习所。毛主席说，农民运动不是痞子运动，是革命先锋。这是我第一次听毛主席演讲。

印象很深刻，一直忘不了他的话”。“不久，北伐军从武汉继续向北打，5月以后，我们在河南打了几仗，与冯玉祥部队会师。会师后的军官会议上，我们这些军官对农会组织、农民运动的态度截然分成两派。一些军官说，湖南痞子太多，过火了！通过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对照就能看出革命或者不革命，不在于他自己标榜是什么”。“北伐战争，从广东到南京、武汉，所以能一路无敌，就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支援前线，巩固后方”。

张平化又讲到追随毛泽东建立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事情，讲如何建立农民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张平化话讲得声情并茂，故事生动，引人入胜。但是，他发现这段历史似乎占用时间过多，说：“历史不多讲了。总之，没有农村的革命，国民革命不能成功。毛主席讲，国民革命，十分功劳，农民占七分。当时，革命不革命，要不要农民运动是个重要环节。”

张平化归结说：“农民应该有组织，此外还有很多理由，但是，最大的道理是两条：现实需要的道理，历史经验的道理。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农民有组织”。

接下来，张平化阐述了农民协会的任务。“大家都讲了很多好的意见，我讲五条：第一条，维护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政府不能侵犯；第二条，在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进行自我教育，党和政府有教育农民的责任，但不能代替农民的自我教育；第三条，动员农民自己参加生产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搞好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也是生产建设的重要内容；第四条，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工农联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五条，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各方面力量，建设现代化强国。他说，将来的农民协会章程，还可以写很多条，甚至八条十条。”

张平化对于农民协会，出乎意外的重视。做了大会总结报告的第二天，12月7日，张平化又再次在天津主持有关省贫下中农协会负责人座谈。张平化说，“今天会议，主要听听同事们对我昨天讲话的意见，有什么问题？张平化对前一天的报告做了新的发挥和补充，感叹有些遗漏，因为年纪大了，记忆力减退。同时谈到，他讲话从来没有列提纲的习惯。在会上，他听大家谈了感想和意见，也回答了关于农民协会的具体问题。湖北代表发言说：“人们说，当初成立贫下中农协会主要就是抓阶级斗争，管制地主、富农的，现在不需要了。”张平化回应：“贫下中农协会也是团结中农的政策，不是孤军奋斗，农民协会成立前，也可以带领所有农民为四化奋斗。在新的形势下，贫下中农协会，不是完全不适用，而是不完全适用，有些章程还是可用的”。天津代表问：“农民协会会员，摘帽地主富农，可否参加？”张平化说：“在章程中研究，一般来讲，所有农民都可以参加”。

三、王任重的部署

实际上，关于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以取代地主富农摘帽后，相互对应的贫下中农协会，副总理王任重有更加集中具体的阐述。或者说，早前一年，王任重就对于成立农民协会有比较成熟的想法。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开、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这个事情成为王任重思考农民协会的重要起点。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向阳招待所（现在的崇文门饭店）召开农村形势座谈会。王任重讲话中，特别批评了在报上宣传“恐右病”，列举了一些社会现象，说这就是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协会还有存在的必要。为地主摘帽和重新审查四不清干部，不能由上边定，都要经过贫下中农，否则地主就会翘尾巴；为“四不清”干部平反，搞得不好，在台上的干部也不服。”由此可说，王任重对于农民协会的政治定位，不同于一般人理解的农民协会。在王任重看来，农民协会的政治功能，首先是对于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继续进行监督甚至管制。或者说，王任重希望成立的农民协会，主要是服务于新形势下的农村阶级斗争。张平化在天津会议上所阐述的农民协会的作用，更强调要维护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利，与王任重的阐述重点又有所不同。

以天津会议作为依据，农委给中央写出了关于建议试验成立农民协会的报告。报告说：12月4日至5日，国家农民邀请了参加全国农民教育会议的省市区贫协负责同志座谈。目前贫协在大部分地区处于停顿状态，少数地区还在活动，但是也很困难。现在，贫协已经不适应形势要求，座谈会一致要求成立“农民协会”；在试验成立农民协会的过程中，希望中央直接发出指示，或者由国家农委发个正式通知，对于农协开展工作给予支持。

1980年1月6日，张平化在上海向王任重汇报工作，谈国家农委当年工作任务，准备给中央写报告。按照王任重与张平化的讨论，农委1980年的工作任务共十条，其中第八条是建议成立农民协会。张平化说，“关于农民协会试点，给中央办公厅的文件已经发出。湖南、湖北、福建，等三个省取得经验，就搞全国的”。王任重说：“搞全国性协会，机构不要多，要很简单。九个省市，一个省出一个委员，中央加几个委员，搞个办公室，十几个人，轮流主持，不驻会的回省里，原来担任什么工作，就搞什么工作。要创新民主管理形式，有人说话就行”。张平化问：“归口在哪里？党群还是农业？”王任重：“归党群”。张平化：“农民协会对农口各部门有监督作用，重大问题征求农民协会意见，开会参加，提意见。这样就好写了。”又说：“上个月在天津开农民协会座谈会，大家很高兴”。王任重：“上边没有人管嘛”。张平化：“看了中办文件大家会更高兴！农民不搞组织，说不过去”。王任重：“没有道理”。张平化又说：“你同先念讲讲”。先念是指当时的中央副主席、主持工作常务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王任重：“是”。王任重又强调：“农民协会要搞小机构。就是搞个渠道，反映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不正确的可以分析么，总比听不到好。供销社如果考虑农民，不会一下子划过来”。王任重：“1958年头脑发热，刮了共产风。中央说不再折腾，但是如果听不到农民的话，不知道能否做到不再折腾。”在这里，王任重更加强调农民协会作为农民利益要求代表的作用，更注重农民声音表达渠道的功能，这显然符合现代性民间社会组织的定位。

1980年2月2日，在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结束时，王任重讲话部署当年农村工作，也谈到了农民协会：“农会到底搞不搞？将来把贫下中农协会改成农民协会，中央办公厅发了文件，各省可以搞一个两个县作为试点，多数同志要求中央搞农会，有工会为什么没有农会？华主席、邓副主席讲，不是不可以有，是因为机构太多，还要考虑，没有说不搞。”

四、邓小平的表态

1980年3月26日，万里同志秘书于廉电话告诉国家农委办公厅副主任金丰：“关于农民协会问题，小平同志有批示，即送来，请照办”。随后，批示传达到农委。

邓小平批示是：“此件压在我处，始终徘徊，未加处理，现在，我倾向不再设贫协，至少一二年内不考

虑。”这个批示的时间是3月22日。

从农委会议资料可以看出，国家农委关于建议成立农民协会的报告是1980年元旦前后报送中央。报送时，王任重还专门给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胡耀邦没有签署处理意见，而是将这个报告转呈送邓小平批示。这个时候，华国锋还是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是胡耀邦没有请华国锋定夺，而是请邓小平定夺。这显示华国锋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复存在。而此前，王任重是直接秉承华国锋的旨意做出安排，并报送报告。3月28日，万里秘书于廉又电话告诉张平化，此件小平直接批给了万里，没有批给王任重，请把批示内容转告王任重。由此也许可以判断，从这个时候开始，农口决策体制已经出现了从王任重-华国锋模式到万里-邓小平的模式转变。

邓小平否定关于成立农民协会的意见，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邓小平的这个决定，显然给国家农委的工作造成了尴尬。此前，国家农委已经在几个省做出了成立农民协会的试点部署，并在全国范围打了招呼，要成立农民协会。邓小平批示后，国家农委办公厅值班室用电话通知各省，不再筹备成立农民协会。

1980年6月4日，张平化主持农委办公会，办公厅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中谈到农民协会问题。“下边对农委电话通知意见强烈，特别是有试点县的湖北、湖南、四川省等地，共同问题是，现有的贫协怎么办？正在试点的农民协会怎么办？”“一方面，前一段中办正式发了文件，说贫协不动为宜，另一方面，国家农委又电话通知，说农民协会不办了，究竟听谁的？”针对这些问题，张平化没有马上答复，而是说：“今天不讨论，打印送党组成员先考虑，适当时候请示万里同志，是否提交党组会讨论”。

此次党组会之后，农民协会事情再也没有研究过。依据现有文献，看不出党组各位有何考虑，以及是否请示过万里。在农委内部，农民协会再也没有进入议事日程。也许，从主持农委工作的张平化来说，指示将各地关于农民协会意见电话记录让打印分送党组成员，本来就是一个托词。也许，就张平化的真实考虑来说，此事邓小平已经表态，这已经是最后的决定，没有必要再研究甚至上报万里。

从各地情况看，在邓小平批示之后，农委专门给下边打了电话，各省随后纷纷撤销了贫下中农协会，已经启动农民协会筹备的地方，特别是有几个省已经在县级开始农民协会试点，也迅速下马。由此，农民协会问题在高层政策议程中销声匿迹。

五、事情背后及后来

邓小平为什么否定建议成立农民协会的报告？邓小平自己没有任何解释，农委党组会上也没有讨论，我们难以妄加解读。如批示本身所说，做出这个否定性批示，对于邓小平来说并不轻松，“始终徘徊”。

在本人看来，邓小平“始终徘徊”直接原因，起码有两个。其一，在全国建立农民协会，这确实是一件大事。据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说，五十年代毛泽东曾经否定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农民协会的提议。显然，成立全国性农民协会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在国务院或者党中央设立一个部门，这是一个中国最大的阶层或阶级组织。不论是理论上，还是政治上，要成立的理由又那么充分，可谓理直气壮，无可辩驳。对于邓小平来说，也许真正的否定理由又不便明说，所以只能不解释。其二，邓小平知道，这件事情是华国锋已经同意的，职能部门经过了充分酝酿，已经做好各种必要的筹备，似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单等一个批示下来。此时，华国锋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在名分和正式权力结构中，还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在批示中直接否定华国锋同意的事情，无论如何会有所顾虑。

根据王任重在2月2日会上传达，关于农民协会问题，邓小平自己也有过支持性的表述。王任重说：“华主席、邓副主席讲，不是不可以有，是机构太多，要考虑，没有说不搞”。也就是说，当王任重向华国锋、邓小平请示的时候，邓小平说了类似华国锋的话，起码是迎合了华国锋的表态。在王任重这个表述中，似乎农民协会只是个机构太多的问题，更直接说是个行政性问题，是在中央部门增加一个机构、几十名干部编制问题。显然，问题没有这样简单。

从当时高层决策体制内部看，关于农民协会问题决策过程，还有个重要的揭示。也就是，在当时的高层决策运行中，当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胡耀邦遇到自己不能定夺的事情时，不是请示中央主席华国锋，而是请示副主席邓小平，显示华国锋的实际性权力已经退居其次。批示是一种正式的权力运行程序，其正式程度还高于内部会议的讲话。华国锋的权力褪色，邓小平成为最后决策者，虽然从道理上讲顺理成章，但是从过程上来看，肯定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因为，华国锋曾经是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权力的转换发生在什么时候，具体说是在何种政治机会窗口中，现在并不清楚。但是，农民协会的决策过程，肯定具有重要标志意义。

关于农民协会，后边的故事相当简单，因为再也没有正式进入高层议事日程。或者说，只是说说而已。2001年12月，杜润生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讲话中说：“80年代中期，我去见邓小平同志。他问：农民有什么问题？我说：农民需要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能否搞农民协会？邓说：党就代表农民的利益。我说：党代表全民，代表政府利益，农民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邓说：可以考虑，如要必要就搞，再看三年。”（《杜润生文集》下册，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1219页）。1990年代初期，一些老同志再次提出建立农民协会，中央领导批示给中央政策研究室调研，再没有下文。（余展高文斌主编《我认识的杜润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255页）。1990年秋天，九号院被撤销，人员正在遣散分配的时候，杜润生、王郁昭、张根生、刘堪等十几位农口部长以个人名义联名上书，建议成立全国农民协会，那时我是王郁昭的秘书，这封信由我安排校对打印报送，泥牛入海无消息。1980年代中后期，九号院撤销前，在杜润生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当时单位里有说法，这将来就是农民协会的基础了。但是，这个联谊会不仅没有扩展为农民协会，现在，连农民企业家的身份认同也找不着了。

中国的改革已经40年，改革启动之初朝野各界就有成立农民协会的呼声，但是迄今没有任何进展。我们似乎说不清阻力何在。如果以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为基准，改革的思路可以分为两个阵营，如果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强调重视为基本，也可以分为两个阵营，而且，这两个思路的对立，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因此，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的消长，都可以从这里这种思路的分野中找到答案。但是，似乎农民协会不是这样。不论对家庭承包制持何种政策态度，不论对发展集体经济持何种政策倾向，人们对于农民协会的支持都态度一致，那就是，认为农民应该有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应该成立。问题在于，虽然对家庭承包、集体经济持不同政策立场的人支持成立农民协会，但农民协会就是无法成立，而且看不到公开反对力量何在。

（来源：爱思想网；写于：2018年11月）

小农户如何对接现代农业

——贵阳市花溪区供销联社打造“三位一体”综合产业体系纪实

李朝民

日前，贵州省贵阳市东盟会议中心礼堂人头攒动，一派热烈喜庆气氛，花溪区供销社股金合作社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大会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时代、新供销”为主题，参会人员有1000多人，是改革开放后供销社恢复社员代表大会制度以来，花溪区供销联社召开的规模最大社员代表大会。会议对股金合作社的发展作了回顾和总结，公开选举增补了社员代表。

股金合作社是花溪区供销联社打造“三位一体”综合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以来，按照中央、省、市有关部署，花溪区供销联社与贵阳广播电视台、贵州亿盛投农业投资公司联手成立贵州供销信供产农业公司（以下简称“信供产公司”）。通过搭建信用、供销、生产“三位一体”综合产业体系平台采用社企融合模式，建立与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等市场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供销社事业发展，为脱贫攻坚、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信供产公司董事长郑智介绍，信供产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组建了以花溪供销股金合作社为代表的信用合作体系、以友黔花为核心品牌的供销合作体系、以贵苗夫现代田园为主体的生产合作体系。如今，三大合作体系稳健发展，初步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三位一体”为农服务的路子。

一、信用合作辟新路

2016年以来，信供产公司在花溪城区和重点乡镇开设6家股金合作社，现有社员4000多人，股金总额超过2亿元，已带领3000余户农户社员创收，实现分红3000余万元。花溪供销股金合作社负责人说，股金合作社成立以来，一直秉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在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前提下，通过社员调剂入股等方式，同步开展各类活动，为社员拓展融资渠道和创利提供了广阔平台。

“股金合作社就是我们农民社员的及时雨。我从外地回乡创业时，主要从事牛奶草莓种植。在基地扩建和设施配套时，由于预算不足，资金周转遇到困难。后来，我听说股金合作社开放了社员股金调剂业务，于是我便向股金合作社申请资金调剂30万元，立马投入到项目中。现在我的草莓基地规模已由原来的7.5亩增加到20多亩，年收益超过30万元。”股金合作社社员曹国建说。

截至目前，股金合作社已调剂帮扶社员280户，有效解决了种植养殖大户和社员生产经营中“短、急、频”的融资困难和产业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基层供销社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带动力。

二、供销合作开新局

为发挥供销合作社的商贸方面优势，信供产公司在贵阳市共建设了8家惠民生鲜超市。同时，还打造友黔花电商平台，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服务。另外，信供产公司还与国内外相关公司和机构开展战略合作，

整合优势资源，让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进入到学校、企业、机构、餐饮渠道与新零售终端，实现真正的供销畅通，确保扶贫基地农产品得到精准销售。

小农户如何实现精准对接大市场？郑智说，关键一条就是花溪区发挥了供销社的组织优势，联合贵阳市150家惠民生鲜超市，与当地农民合作社、农户等签订采购协议，进行基地联采，不仅解决农产品销售渠道问题，还为农户减免了产品运输费用和运输途中的损耗；同时，公司还运用自己电商平台对产品的销售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对农户提前下采购订单，保障农户的合理供应价格，帮助农民足不出户就能实现优质优价。

“我们通过线上订单和线下体验，以互联网+实体超市，形成产业融合，直采直供，实现一体化服务，让黔货出山成为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新引擎’。”郑智说，“我们‘三位一体’供销合作平台已为广大农户和社员创收1000多万元，带动693户贫困户2000多人实现精准脱贫。”

三、生产合作绽新颜

清镇市王庄布依族苗族乡位于贵阳市西北部，是贵州省扶贫开发二类重点扶持乡。王庄乡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地势高低不平，石山多，坡耕地面积占60%以上。农业主要是种植玉米、酥李和油菜，村民日子过得很紧巴。

转机发生在2016年11月。信供产公司旗下贵苗夫农旅发展公司与该乡小坡村、打磨冲、簸涌村等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建立了贵苗夫现代田园桃产业基地。该基地规划用地5000亩，已投产面积为3084亩，其中有机农业种养区为2600多亩。同时，为了达到循环经济的效果，信供产公司还建设了生猪养殖基地。

“信供产公司规划投资9000万元运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打造一个集有机果园种植、有机蔬菜瓜果种植、生态香猪养殖、百花百果观光体验及红色文化旅游为一体，以有机循环农业与旅游融合发展为特色的田园综合体。”信供产公司总经理郑文灿介绍说。

“如今，我们通过‘三变’改革，已经有463户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取得股权证，两年来土地入股分红收入467万元，当地劳务用工达到1.3万人次，劳务收入高达120万，其中村集体、合作社、入股农民和低收入困难户还能享受贵苗夫现代田园桃产业基地公司年净利润10%的分红。”小坡村村委会主任杨传军说。

谈到花溪区供销联社改革及信供产公司的实践探索，花溪区供销联社主任陈华信表示，近年来，花溪区供销联社始终坚持把提升为农服务能力放在首位，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搭建起了为农服务的综合平台，不仅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而且还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目前，信供产公司“三位一体”合作产业体系已初见成效，将进一步提升为农服务能力，为贫困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活力。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供销社回归合作经济本源、密切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的一场深刻变革。这样的变革，不但实现了农民出资、农民参与、农民受益，供销社自身也享有股份收益和服务收益，与农民真正结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贵州省供销社党组书记、副主任向忠雄表示：“以前的供销社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为农服务的主力军和大平台。按照中央一号文件，近几年我们也在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为农服务的路径和模式，走出一条‘三位一体’的新模式，可以说在全国供销系统中是走在前面的，农民们都说供销社强势回归了，尤其是花溪供销社在‘三位一体’的探索方面为全省树立了一个旗帜。”

（作者：农民日报记者，2018年12月17日）

八论践行“三农”必须强、富、美

——打造农村三产一体新型集体经济创业平台，精准稳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李毓堂

最近中央出台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以下简称《规划》）拉开了践行“三农”必须强富美的序幕。《规划》从背景总体要求、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构建新格局、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壮大农村产业，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文化、健全治理体系、改善农村民生、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及规划实施等十一个方面作出全面部署。尤其是规划中提出：“要坚持农民为主体地位”、“改革创新激发活力”、“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水平”、“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农村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农村产业融合新载体新模式”、“推进农村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和田园综合体试点建设”、“激活农村创新创业活动力”、“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建立健全整治长效机制”等发展战略，对当前农业农村深化改革与创新，破解长久以来“三农”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实施这样一个宏伟《规划》，如何能精准稳地实现，需要打造一个综合治理改革创新的大平台，把各类问题和目标任务集中纳入一个系统工程机制中，通过互动互促达到综合集成。这一平台，就是本文建议的农村现代三产一体新型集体经济联合体（以下简称《新型集体经济》）。现将打造这一平台的必要性、优越功能和发展中需关注的问题，论述如下：

一、发展现代三产一体新型集体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实践

（一）马克思指出，“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恩格斯指出：“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物质方面的因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结合体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把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看待的。

（二）邓小平指出：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需要，要发展规模经营的集体经济。

（三）钱学森指出，在信息革命之后，世界将迎来第六次以生物工程为主的新技术革命和大农业产业革命，发展知识密集型、农工贸一条龙的五大（农、林、草、沙、海）新型产业化经济。

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是国家发展大局战略需要，是“三农”必须达到强富美的需要

（一）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这一科学理念，明确了农业现代化和“三农”发展的最终目标。成为乡村振兴中华振兴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必须走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道路。

（二）是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的需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农业要走出化学污染困境，向绿色生态农业转型升级，必须普及以生

物工程为主、同信息、机械、水利、种业等相结合的配套技术。这就必须创造规模空间、财力物力、人才队伍等三大前提条件。而这是目前小农或大户经营方式无法做到的。唯有创建新型集体经济，才有条件打造这样的平台，确保现代科技普及，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

钱学森在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论述中，贯穿着生物技术普及的红线。

（三）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需要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我国农业要摆脱单一从事第一产业成本高效益差、劳动生产率低的困境，就必须把农业生产、加工、商贸连为一体，形成物质循环、能量转化、资源集约、生态优化、高产高质、低本高效的大农业新型产业系统，从而极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确保农业走强。这也是小农经济或经营大户或农工、农商企业难以做到的，唯有打造新型集体经济才能济事。

钱老 2000 年致江总书记函中就提出，发展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一开始就实行一二三产业一条龙。

（四）是实现农村产业兴旺农民共同致富的需要

“千条万条，增加农民收入第一条”。农民富是国家富的基础。如何走出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连年扩大的困境？使农民共同致富？在国情条件下，既不可能走西方农户以土地规模效益取胜的道路，也不可能靠土地流转拼大户方式或靠小农与农工、农商企业对接利益分割的方式达到目的。唯有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发挥农业资源、各生产各要素潜力，通过科技普及、规模经营、三产连锁，大幅提高产值效益收入，才能确保农民共同致富。

（五）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需要

内因是事物的决定性因素。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包括农业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基础建设、生活设施改善、乡村文化繁荣、优良传统弘扬、“三治”水平提升及建立长效治理体系等在内的巨系统工程，仅靠行政方式和外力帮助是难以奏效的。唯有建立新型集体经济平台，发挥集体组织力量，才能增强农村内动力，确保美丽乡村建设成功。

（六）是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需要

良禽择木，英雄要有用武之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大批领军人才、科技管理队伍和智能劳动大军。没有规模大、业域广、有奔头的创业创新平台，就难以培育农村人才成长和吸引社会人才聚集农村。现时的小农经营、大户经营或农工、农商企业方式难以建立这样的平台。唯有打造新型集体经济创业平台，才能达到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钱学森在论述实施第六次产业革命时提出，首要措施是必须大力培养农业型专业人才。

（七）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有 7 亿人脱贫进入温饱阶段。剩余的贫困人口将在 2020 年全部脱贫。如何巩固成果建立防范返贫的长效机制？仅靠政府力量或外力支撑绝非长久之计，唯有将农户组织起来加入新型集体经济共同创业增收，才是杜绝返贫的长效机制。

（八）是《乡村振兴规划》全面落实落地的需要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农村一盘接。要确保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各项部署重大工程、计划、任务贯彻落实到位，仅靠乡村干部面向千家万户是很难做到的。唯有把农户组织到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中来，发挥集体作用，方能确保《规划》全面落实落地。

三、发展农村现代三产一体新型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战略功能

（一）建立起农业农村以新型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同工商城市建立以国企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形成国家城乡社会主义经济两大支柱。这将确保国家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全面实现。

（二）建立起“三农”一体发展新机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得到全面实现

发展现代三产一体新型集体经济把“三农”发展纳入一个互动互促协调并进的有机体，把改革创新科技管理、经营体制、产业结构纳入一个系统工程，统筹运作。从而确保“三农”强、富、美目标得到全面实现。

（三）确保农业新科技普及应用，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新型集体经济为农业科技普及提供了优越的规模空间、财力物力、人才队伍条件，为科技新成果转化、产学研结合，农业自主创新开辟了广阔天地，确保农业迅速摆脱化学污染困境，向绿色生态农业转型升级。

（四）建立起大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体系，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大提高

在农工贸（种养加销）连锁运作中，通过新科技应用和系统管理（制定投资效益核算、产品质量标准、技术经济指标、生产操作规程、监测监控体系等规章制度），建立起系统优化、资源集约、物质转化、环境优良、产品优质、成本节约、多层次高效益的大农业循环经济，就能确保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五）创立适度规模联产承包家庭农（牧）场和集体经济相结合的致富机制，确保农民共同致富

新型集体经济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由于三产一体运作中部分农户分流到二三产业生产线，就腾出大量土地供一线农户扩大承包规模；再通过统筹安排资金、装备和技术培训，承包户就可升级为现代家庭农场。除获得家庭承包报酬外，还可获得二三产业增值的红利。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双层经营双赢共富的机制。农民获得二三产业收益权、幸福致富路和安全自强能力，才有真正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六）建立起建设美丽乡村内动力机制，推进各项任务指标全面实现

新型集体经济从三方面增强乡村建设内动力：一是三产一体发展的经济实力，二是集体组织力量和智慧，三是人才队伍。这就把建设美丽乡村同发展新型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全方位开展清洁生产、生态修复、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等各项建设，真正形成乡村治理长效机制，确保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

（七）搭起农村人才汇聚大舞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开创亿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好局面

发展三产一体新型集体经济开辟了业域广、面积大（含盖农田、林地、草地、沙地、海疆）、产业多、门类全（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全领域）、前景阔的创新创业大舞台，使农业真正成为“有奔头的产业”、“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可“安居乐业的家园”。从而极大地吸引社会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加上实践中培育成长，就形成雄厚的领军人才、科技管理队伍和智能劳动大军，开创农村亿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好局面。

（八）开辟了未来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探索之路

马克思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目标，是消除人类社会工农间、城乡间、体力和脑力劳动间的三大差别。然而采用何种实践模式？一直是待解决的问题。钱学森提出的开展大农业技术和产业革命，发展知识密集型农工贸结合的高技术产业化集体循环经济，就是走向这一目标的实践探索。

钱学森给江总书记的信中说：“这种高技术产业化的农业，实际上已和工业及经贸、服务等第三产业结合起来了，所以可以做到对农业生产实行工厂化管理。由此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已大大缩小了工、农之间以及城、乡之前的差距。这也是我过去说的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必然成果。按照这种思路发展的结果是，我国西部地区不仅将摆脱贫困，而且将在 21 世纪的中后期，迈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探索，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未来社会发展都具有科学指导意义。

四、农村发展现代三产一体新型集体经济过程中需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列为工作重中之重的重点和国策，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把手。

要自上而下制定支持农村发展现代三产一体新型集体经济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运用系统工程理念方法，按照中央规划要求的精神，付诸实施。

（二）明确发展重点区域

按照中央规划的分类，发展重点首先放在占农村绝大多数的“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农村。也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农村调查分类中的粮食主导型、果蔬园林区型、特种作物型、畜牧养殖型、草原牧场型、多元发展型等农村。

（三）因地制宜，确定新型集体经济的主导产业

按照中央规划的农产品主体生产优势布局 and 专业化生产格局区，确定不同区域新型集体经济的主导产业，并严格按照规划要求：“调整农业结构，壮大产业优势，确保产品质量，打造知名品牌，提升出口行动。”

（四）坚持典型引路，示范推广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首先要搞好中央规划提出的“推进农村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和田园综合体试点建设”，通过典型示范精准稳地分批推广。要借鉴历史上“办公社”的教训，防止搞哄起运动。

（五）小农经济加入新型集体经济转型升级，要每户建一项目

按照总体规模、三产发展目标和每户具体情况，制定家庭农牧场规模、承包内容、技术装备建设及技术培训等实施计划，以签订合同方式，建立起双层经营双赢致富的机制。

（六）统筹资金，捆绑使用

发展现代三产一体新型集体经济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资金来源除农民自筹、社会支持外，要把国家用于各项支农惠农资金捆绑使用，统筹安排。国家扶持民营企业和微小企业资金以及金融、财政优惠政策，也要优先用于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体建设项目。国家教育部门要为农村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输送人才和开展定向培训，国家农业、工信、商贸部门要组织干部下乡蹲点帮助农村创业。文化卫生部门人员要到农村一线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国家宣传部门要动员新闻媒体，报导农村新技术和大农业产业革命的创新成果和典型经验，大造社会舆论推进这一历史创举。

（七）尊重自愿选择，形成农村以新型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多成分并举的经济体系

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中，要充分尊重现有经营大户和农工、农商企业的选择权和发展权，形成农村以新型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成分并举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作者：高级经济师、研究员，国务院颁发农业技术突出贡献证书及政府特殊津贴，英国皇家联盟科学院荣誉院士；原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研究员、牧区办主任，国务院京津冀周围绿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应该记住这些早醒先行的小人物

李克军

在我国改革开放大业之中，邓小平、胡耀邦、万里、习仲勋、任仲夷等中央和省市领导人居功至伟。是他们，以极大的胆略和气魄顺应民意，回归常识，推动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但是，古往今来，民间都不乏高人。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的“包产到户”，而且是由贫困落后的小岗村（当时是生产小队）农民为了不饿肚子自发搞起来的。他们的出发点和行为既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然而，从时间节点上看，“包产到户”的尝试，早在 20 多年，就已经出现；从思想深度看，有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党员，对涉及改革开放的诸多理论问题，早有精辟阐述。

一、“包产到户”的先行者

第一波“包产到户”的尝试发生在 1956 年春天。当时，“合作化”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但“合作社”管理上的弊端已经显现，很多地方出现“拉马退社”风潮。同时，四川江津、安徽芜湖、浙江永嘉等地的一些农民自发地搞起“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岳朝娟：《对包产到户的历史思考》，《南都学坛》，2002 年 9 月）。其中，浙江永嘉县的“包产到户”起步早，规模大，效果好，得到一些农村问题专家的高度赞誉。

1998 年，我国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老先生到这里考察后说：永嘉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永嘉的这次试验开创了农村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是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包产到户”试验。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说，“永嘉包产到户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它同凤阳的胜利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共同的真理。”

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先行者们为县委领导、县委农工部、县农业局和一些区乡的干部，其中贡献突出的有三位：当时的县委书记李桂茂，副书记李玉河（开始试验时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派到燎原社进行试点的工作组组长、亲手完成试点全过程各项工作的戴洁天。

1955 年冬天，30 多岁的戴洁天作为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到潘桥集体农庄开展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工作中，他和农业社干部、社员一起，建立起“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使潘桥社生产管理上了一个台阶。他写出的报告《潘桥社建立个人专管地段的生生产管理劳动质量负责制的报告》，得到温州地委的肯定。

在实践中，戴洁天深感不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作用极其有限，因此他大胆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

1956 年 5 月，县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是否采纳戴浩天的建议，实行“包产到户”。在 5 人赞成，4 人反对的情况下，县委书记李桂茂冒着政治风险，果断拍板，决定派戴洁天带工作组到一个较大的“燎原社”进行

试验。

从1956年5月开始，戴洁天白天下田劳动，夜间开会研究工作。经过4个月的艰辛探索，于当年9月拿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这份总结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结合永嘉当地实际情况，阐述了合作社实行“包产到户”的必要性，并详尽地写出了具体做法。杜润生老先生说，这是中国第一份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包产到户进行深入、系统、科学的总结。时间虽然过去45年，但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富有生命力。

1956年9月17日，县委书记李桂茂毅然决定，在全县不同类型地区进行“包产到户”“多点试验”。全县200多个农业社，占农户总数42%的人口实行了“包产到户”。温州地区各县也很快受到“传染”，瑞安、平阳、文成等县也实行起来，据统计，1957年春天，温州地区各县共有1000多个合作社自发、公开地实行包产到户，包括17.8万农户，占全地区农户总数15%。

在受到媒体责难之后，县委书记李桂茂与刚由宣传部长升任县委副书记的李云河、戴洁天等人商讨，写出了专题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上报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党中央农村工作部。这份专题报告在戴洁天《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的基础上，对包产到户理论上的正确，实践中的突出作用，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阐述。党史专家廖盖隆同志说，“这是全面阐明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第一篇论文”。浙江省委领导曾一度表示对永嘉县试验的支持，争论也一度扩展到全国。但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全面展开，争论很快演变严酷的政治批判和无情的组织处理。温州地委委员、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定为“中右”，撤职后贬为瑞安县塘下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作组组长戴洁天被戴上“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项帽子，开除公职，判处管制三年。全县因参与包产到户而被判刑劳改的达20多人（陈大斌：《包产到户实践者戴洁天的遭遇》；中国青年报：《戴洁天父子的命运》）。

二、敢于担当的“地方官”

1956年9月，面对高级农业合作化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广西环江县委通过调查研究并由常委会讨论决定，在边远山区实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这种办法曾一度得到地委的肯定，但1957年，县委却被戴上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县委书记王定被划为极右，副书记车丙寅、陈朝群被划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谭彦明、李坚被划为中右；全县八个区四个区委书记被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则被扣上“王定的社会基础”的帽子，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后任县委书记吸取了王定的“教训”，大搞浮夸风，于1958年9月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最大卫星。环江县成为大跃进运动的重灾区（卢蒙坚：《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遇》）。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等极左风潮（史称“五风”）同时泛滥，使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陷入困境。

1959年2月，云南省建水县县委书记王安广到任后，给农民发还自留地、自留牲畜，开放集市贸易；将3个公社从大队所有制改为小队所有制；提出停止办公共食堂、分口粮到户、自愿参加食堂。1960年2月，

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建水县志》，转引自李若建：《“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

1959年5月——7月，河南、江苏、湖南、广东、甘肃、陕西等省再次出现“包产到户”。有资料显示，这一轮“包产到户”，虽然主要是农民和基层干部自发搞起来的，但在有些地方，得到地委一级干部的支持。如，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认为，集体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由。他提出：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把50%以上的生产队分开，按户包给家长。于是，60%的生产队重新丈量土地，出现了夫妻田、父子田、姐妹田。当年，实行包工包产到户的公社175个，占总数的72.9%（胡安全：《当代中国家庭承包的历史逻辑》（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也主张包产到户。当地委专门召开会议正式作出制止的决定时，王慧智仍提出留个重点“比比看”（《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56页）。

庐山会议以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国展开。地域广泛且得到部分中级干部支持的“包产到户”之火，只烧了一百来天，便基本熄灭了。

三、“顶风上”的小干部

“文革”期间，“包产到户”和“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并称为“三自一包”，被列为刘少奇搞修正主义的一大罪状。但农民心中的希望之火并没有完全熄灭，很多地方偷偷摸摸地搞不同形式的包产到组、到户甚至变相分田单干。

1975年，重庆市荣昌县吴家区清升公社出现严重的“右倾单干活动”。1977年，全社53个队，就有32个队下放土地1000余亩，大搞单干活动。九大队一队不顾上级阻止，先后五次私划土地近百亩，包给三个生产小组。生产队长李万玉说，“我充其量队长不当，党籍开除，就是今后砍脑壳我都要坚持个人收。”结果，他被撤销队长职务并多次遭受大会批判（周青、黄娟：《荣昌，1975年的“单干”》，《中国档案》2008年第10期）。

1978年2月15日，山西省闻喜县裴庄公社南郭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包产到户和小岗村一样具有悲壮色彩。23岁的生产队长孙炳新把73亩棉田包给了19户社员。社员还签了一份秘密合同：一是谁也不能说出来，杀头也不能让上级知道；二是一定要把承包田搞好，不能让人找出毛病；三是按合同办事，年底一定要兑现。结果，尽管当年遭受了旱灾和虫害，棉花亩产仍由过去的12.5公斤增加到42公斤，比历史最高年份的产量翻了一番。当时的县委书记张世贤，一直暗中支持“联产计酬”。在听说孙炳新的事后，他立即到南郭村，对孙炳新表示支持。到1979年春天，孙炳新干脆把队里的全部土地、牲口都分给了社员。借着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东风，中共闻喜县委批转了这个队的经验，使不少生产队也实行了包产到户。到1980年初，闻喜全县有75%以上的生产队将棉花和秋粮作物联产到劳；有8%的生产队将小宗经济作物和工副业实行了大包干；有8%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南郭村乃至闻喜县的做法令当时的山西省委震怒。几个月后，张世贤被安排去省委党校“学习”。同时，运城地委工作组到闻喜“纠偏”，要求各公社办学习班，批判并纠正南郭三队的做法，轰轰烈烈的改革之火被扑灭。直到1981年，新任省委书记到闻喜考察，肯定了南郭三队的做法，改革春风才重新吹绿了山西大地（张世贤：《承包之花闻喜开》，2008年10月1日《山西新闻网》）。

四、农民思想家的命运起伏

1998年——2002年，《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南方周末》、《三秦都市报》等诸多媒体

报道了陕西农民思想家杨伟名追求真理直言上书的感人事迹。

杨伟名，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现甘亭镇七一村）人。1922年出生，读过3年私塾，家贫辍学。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年2月入党，1949年5月任职副乡长，当年冬天自行脱党还乡，1957年重新入党，后任生产大队会计。

1960年——1961年，勤于学习和思考的杨伟名先后写出《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等五篇文章，送给公社和县领导。针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他提出了理性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该“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贫富差距应允许存在，只要不出劳动致富的原则”；“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宜小不宜大……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只有尊重了“价值规律”，启动自由市场价格杠杆，才能真正把国民经济调整过来，进入良性轨道，等等。他的预见在90年代全部兑现。

1962年春天，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党和国家进行政策调整，上上下下都在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杨伟名面对“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心急如焚。他凭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农村工作的深入思考研究，写出题为《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的建议信。由他和大队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三人共同署名后，于5月10日分别寄给了公社、县、地区、省、西北局各级党委和党中央，同时还寄给了陕西日报、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渭南、华县、潼关三县委的负责人。

这篇建议信共分13节，近万字。

文中，杨伟名概述当时农村经济形势时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并质疑：“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他指出：“看来形象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迅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他说，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已收到效果，不过，远未到位，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地“调整”，直到克服困难为止。

杨伟名明确提出要“恢复单干”，但认为“不必恢复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可实行“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的办法。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刘华珍同志在《一叶知秋》四十年祭中就此感叹道：“20多年来，人们都说，我国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1978年起始于安徽省凤阳县。殊不知，在此之前的16年，陕西户县就有人向中央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建议。令人痛心的是，这个建议，20年后才变成中央的政策，而此时，杨伟名已在地下长眠14年。”

杨伟名在文中还对中国大势作了异常清晰的判断，他说：“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得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

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因此他认为：“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在文章后记中，他进一步说明：“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这个命题，与几十年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何其相似！

在这篇文章中，杨伟名还通过一些鲜活生动的比喻来阐述自己的辩证哲学思想，很是贴切。如他把党的政策比作“处方”，喻为“腰带”。他认为“处方”要根据病情发展不断调整，“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

“腰带”“一定要松紧适度。”“腰带松了不行，过于紧了也不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从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20年后“放开搞活”的影子。

杨伟名还用“双程轨道”作比喻，对如何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积极建议。

多年后，时评作家鄢烈山说：“今天看来，这些最基层的农民和党员是具有何等的远见卓识！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实行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思路、基本政策，都可以从中找到萌芽和雏形”。著名历史学学者雷颐在题为《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中说：其“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令人震惊。在共和国历史上，这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在当代思想史上，这份文献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对市场经济理解、阐述深刻生动，对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精辟和‘先见’都令人观止。”杨伟名的一位同乡哽咽着说：“在中国的问题上，杨伟名比我们至少早觉20年。”。

《当前形势怀感》一文寄出后，杨伟名和这篇文章一起经历了大起大伏的命运。从5月10日到8月初，咸阳专署和陕西省委宣传部门的领导相继给杨伟名复信，对他寄予鼓励。省委宣传部《宣传动态》和中宣部《宣教动态》相继刊登了《当前形势怀感》摘要。咸阳地委研究室和西北局内部刊物《西北建设》分别聘请杨伟名为特约研究员和通讯员。

然而，8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一叶知秋”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当前形势怀感》被定性为“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杨伟名等3个党员被迫检查。“文革”中，杨伟名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5月5日晚服毒身亡。

1979年4月，中共户县县委为杨伟名平反昭雪。2002年7月，户县县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杨伟名思想研究座谈会”，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说，杨伟名“是伟大的农民思想家，农民才子，更是农民英雄……他胸怀坦荡，忧国忧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胆有识，才华过人。杨伟名思想态度鲜明，逻辑缜密，论理透彻，见解精辟，有系统性，前瞻性，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会议决定：一、成立民间社团“户县杨伟名思想研究会”。二、编辑《杨伟名文集》；三、拍摄杨伟名电视纪实片；四、举办杨伟名生前实物展；五、修建杨伟名墓园及整修故居；六、举办杨伟名事迹报告会；七、组织撰写论文；八、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外宣活动（卢跃刚：《不平常的追悼》，《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21日；范超：《一位乡村思想家的远见卓识——杨伟名上书党中央始末》，《三秦都市报》，2002年11月29日；王一士：《平凡人的伟大——为杨伟名和三个共产党员来信正名》，《陕西史志》，2002年第5期）。

（来源：爱思想网；2019年01月09日）

2018 年：历史性的拐点——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2018 年的出生数是清朝中期以来最少

易富贤 苏 剑

提要：2016 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 年出生不但没有如预期那样多出生 343 万人，反而减少 63 万人（减少 3.5%）；2018 年不但没有如预期一样多生 79 万人，全国活产数反而少了 250 万人（减少 14.2%）。抽样调查显示 2015 年、2016 年的生育率只有 1.05、1.24，2018 年的出生数只是 2016 年的 83%，根据育龄妇女结构推算，2018 年的生育率只有 1.05 左右（低于 1.1 是大概率，甚至可能跌破 1.0），远低于官方 2012 年预测的 4.4、2015 年预测的 2.1。采纳 2015 年的抽样调查的年龄结构（官方）和联合国预测的中国死亡模式（与官方预期寿命一致），2018 年的生育率为 1.05，那么出生 1031 万人，死亡 1158 万人，负增长 127 万人。由于官方的总人口存在上亿水分，采纳缩水后的人口结构和滞后台湾 17 年的死亡模式，2018 年的生育率为 1.05，那么出生 941 万人，死亡 971 万，负增长 30 万人。清朝中期的 1790 年，中国人口突破 3 亿，出生超过 1000 万人，也就是说 2018 年的出生人数是清朝中期以来最少的。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

1960 年中国在部分地区试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1973 年在全国展开。1980 年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从 1973 年的 4.54 快速降至 1990 年的 2.3、2000 年的 1.22、2010 年的 1.18。

1990 年以后，中国的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那时就应考虑停止计划生育。但是，决策部门和主流人口学家却不相信生育率会如此之低，他们一次次将 1.2 左右的生育率修改为 1.8。比如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在 2006 年判断“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 1.8 左右，并稳定至今”，并预测继续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总人口将于 2015 年超过 14 亿人（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5 年只有 13.75 亿人），到 2033 年前后达到 15 亿，建议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口是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认识到“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而“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习近平明确指示，“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于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果断决定调整人口政策。

依照这种执政理念，人口政策调整幅度原本可以更大。2014 年之所以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是因为蔡昉等“20 多位顶级人口学家”在《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预测，如果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将

反弹到 4.4，每年将出生 4700 万人，峰值人口将达 15.35 亿人；即便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也将反弹到 2.4。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预测，如果全面二孩，年出生人口将达到 4995 万人，生育率将达到 4.5。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先实行单独二孩。当时国家卫计委预测，每年会多出生 200 万人，生育率将反弹到 1.8 以上。

2015 年是单独二孩出生高峰年，《统计年鉴》、《卫生统计年鉴》分别显示，不但没有多生 200 多万人，反而少生了 32 万人、64 万人；“小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 1.05，而不是 1.8，更不是 2.4。

全面二孩政策也遇冷

2015 年国家卫计委组织了由翟振武牵头的专家组，进行反复测算，国家卫计委主任、副主任“多次主持专题研讨会，充分听取专家意见”，最终完成了由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担任主编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他们预测 2016 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的生育率将分别为 1.63、1.97、2.09，出生人数分别为 1767 万、2110 万、2189 万（2017 年会比 2016 年多出生 343 万人，2018 年比 2017 年多出生 79 万人）；2030 年总人口将达 14.50 亿；2050 年生育率还有 1.72。

采信他们的预测，于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全面二孩政策。2016 年 1 月 1 日政策落实，9 个月的怀孕期之后迎来了出生高峰。

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上年的年度人口抽样调查的生育率。但是 2016 年的生育率远低于预期，于是在有关部门和人士的强烈劝阻下，《中国统计年鉴-2018》临时删除了 2016 年生育率表。几个月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7》公布了 2016 年的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只有 1.24，根本没有国家卫计委所宣称的“1.7 以上”。

2017 年是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但是《统计公报》公布出生人数不但没有增加 343 万，反而减少了 63 万。由于生育率远低于预期，《中国统计年鉴-2018》再次没有公布。

2016 年 10 月 11 日，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2017 年 8 月 1 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都提出要确保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要严惩统计造假。但是 2017 年、2018 年的《统计年鉴》没有依过去几十年的惯例公布上年的生育率，是违背了深改组和统计法所强调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精神。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8》（还不知道是否与《统计年鉴》一样删除生育率数据）还没有出版，因此还无法知道 2017 年的真实生育率。由于 2017 年出生人数减少了 3.5%，我们将 2016 年抽样调查的育龄妇女结构平移，推算 2017 年的生育率只有 1.2 左右，而不是预期的 1.97。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初步数据，2018 年不但没有多出生 79 万人，反而少生了 250 万人。由于出生同比减少了 14% 以上，我们推算 2018 年的生育率只有大约 1.05，只是国家卫计委 2015 年所预测的 2.09 的一半，只是蔡昉、翟振武当年所预测的 4.4、4.5 的四分之一！

2018 年的生育率低于 1.1 是大概率事件，甚至可能跌破 1.0。当然最终结果还有待一年多之后才会发布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9》（假如没有删除生育率数据的话）来验证。

间接数据也佐证了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确实很低。中国所有人都可以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与生

育政策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社会发展水平、养育环境相关，是生育环境的晴雨表。一孩次生育率是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 0.95。2015 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分别为 0.60、0.65、0.60、0.63，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18、1.20、1.24、1.24。中国 2015 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 0.56，说明生育环境极为恶劣，即便停止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也只能达到 1.1，那么在全面二孩政策下，2018 的总生育率为 1.05 左右也是合理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是极端夸张。

1992 年-2010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 51%~57%，比如 2005 年理想子女数是 2.11 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 1.26。近年中国台湾的理想子女数还在 2 个以上，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 1.1 左右。多项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平均每个家庭平均只想要 1.6-1.9 个孩子，那么在全面二孩政策下，2018 的总生育率为 1.05 左右不令人意外。

2005-2017 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韩国的平均生育率分别只有 1.10、1.12、1.08、1.23、1.19。而中国大陆除了与这些中华文化圈地区的共同原因外，还因为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并且社会、经济、教育模式也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进行的，并将惯性延续。

东北的生育率下降领先全国，2000 年、2010 年、2015 年分别只有 0.90、0.75、0.56（意味着下一代人只是上一代人的 1/4）。中国的理想子女数和一孩次生育率都是全球最低，意味着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生育率在短期内会波动在 1.0 左右，长期则将沿着东北的老路继续下降。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据存在的问题

中国每 10 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0 年）和一次“小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5 年），每年进行一次年度抽样调查。人口数据最可靠的是人口普查，其次是“小普查”，然后是年度抽样调查。普查、抽样数据中最可靠的是生育率，是“直接汇总的结果，没有经过修正和调整”，并且是 15-49 岁育龄妇女及其孩子的 35 套“榫卯”结构，偏差不大；后面多套数据表明，普查、抽样的生育率数据误差不大，也符合人口变化规律。

但是 1990 年以来，中国人口统计非常混乱，以存在“超生漏报”为由弃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而不用，而是采纳其他数据（教育、医疗）来校正出生人数和生育率。比如说，2000 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 1.22，0 岁人口只有 1379 万；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 2000 年出生了 1771 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口统计的副局长张为民、普查处长崔红艳在《人口研究》上的论文，他们修改出生人数是参考小学招生数据，因为 1997 年之前的小学招生人数与人口普查数据一致。1997 年之前小学招生准确，是因为当时中小学教育经费由乡村承担，没有虚报学生的必要。但是后面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现在西部地区为 8:2，中部地区为 6:4，学校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机虚报学生数以获得更多经费，随着年级的增加，在校生不断缩水。比如，2006-2008 年这三年小学招收新生（6 岁入学）合计 5161 万人，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0-2002 年出生 5120 万人一致；但是这些孩子到 2014 年初中一、二、三年级（义务教育阶段净入学率为 99.8%，毛入学率 104%），合计在校生只有 4343 万人（该年龄段死亡率极低，可以忽略）。可见，即便以初中在校生人数（应该还有一些水分）为标准，当初小学招生和公布的出生数据也存在巨量的水分。

2000 年的 0 岁人口到 2010 年是 10 岁，到 2014 年读初三，到 2015 年是 15 岁，都不存在漏报了。2010

年普查、2010 年公安户籍载明的 10 岁人口分别只有 1445 万人、1438 万人；2014 年初三在校生只有 1426 万人，由于毛入学率（在校生数占相应学龄总人数的比例）为 104%，那么 14 岁实际只有 1371 万人；2015 年“小普查”15 岁只有 1357 万人。可见，2000 年普查的 0 岁人口误差不大，而公布的出生 1771 万却有近 30% 的水分。

其他国家都没有中国这样的“双轨制”，生育率和出生人数是吻合的。比如美国公布 2010 年出生 400 万人（推算生育率为 1.93），生育率 1.93（推算出生也是 400 万）。

2010 年之后，中国人口“双轨制”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比如说，2015 年“小普查”的抽样比为 1.55%，共抽样了 15-49 岁育龄妇女 5667870 人，该年生 175309 个孩子，生育率 1.05。与 2010 年普查的 10-44 岁妇女比较，2015 年 15-49 岁妇女每个年龄的抽样比都在 1.55% 附近，偏差不大；出生人口 175309 人也理应除以同样的抽样比 1.55%，那么 2015 年总出生 1131 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 2015 年出生了 1655 万人，多出了 46%。

近年国家统计局修改出生数据，除了用教育数据外，也用医院分娩数据。2008 年之前医院分娩数据是准确的，因为生孩子是付费的。但是 2008 年之后活产数也存在大量水分了，原因有四：第一，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在 2008 年开始覆盖全国，农民生孩子可以报销了，基层政府、医院、个人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分娩数。第二，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由 2010 年的 27.5% 上升到 2014 年的 56.6%，在常住地生孩子后，在原籍再“生”一次以便获得各项福利。第三，近年取消低龄组上户限制，家长乘机虚报新生儿以获得多个户口。第四，2013 年卫生部和计生委合并为卫计委之后，活产数据受计生系统影响，以“符合预期”。

可见，不能用教育、医疗数据来否定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国务院《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也提出“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加强人口中长期预测”。

以前总是以“超生漏报”为由维持人口的“双轨制”。其实超生所占总人口比例很低，对于大众来说，隐瞒人口无利可图，而虚报人口不但个人获利（上学、买房、低保、扶贫款、退休金、城乡福利），地方政府也可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和转移支付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尤其是计生部门通过虚报人数继续计划生育。

2014 年、2016 年实行了单独二胎、全面二胎政策，不存在“超生漏报”了，2016 年的生育率只有 1.24，那么只出生 1200 多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出生了 1786 万人（生育率在 1.7 以上）。依照惯例，国家统计局应该会公布 2018 年出生了 1400 多万人（甚至 1500 万人），死亡 990 万左右。

2018 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本文的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 年》中、低方案平均（比较符合事实）。

中国人口采纳两套基础人口结构和两套死亡模式。第一套人口结构是采纳官方认可的 2015 年小普查的年龄结构数据，人口总数是与统计局公布的一致，2017 年总人口为 13.90 亿，占世界的 18.5%，65+ 岁老人比例为 11.3%。

但是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990 年以来的出生人数存在水分，导致人口总数累计存在上亿水分，我们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中国经济报告》2017 年 10 期）、《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2016 年中

国只有 12.8 亿人》（《社会科学论坛》2017 年第 12 期）进行了详细分析。本文第二套人口结构是采纳缩水后的人口数据，2017 年总人口为 12.80 亿，占世界人口的 17.3%。

第一套死亡模式是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中的中国模式（与中国官方公布的预期寿命一致）。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超前大陆 20 多年，预期寿命超前大陆 17 年，第二套死亡模式是采纳台湾地区的数据，假设大陆的预期寿命和年龄别死亡率滞后台湾 17 年。

在第一套（官方）人口结构下，采纳联合国的中国死亡模式，2018 年的生育率为 1.05，那么出生 1031 万人，死亡 1158 万人，负增长 127 万人。如果今后的生育率稳定在 1.05，那么 2050 年、2100 年总人口分别降至 11.36 亿、4.63 亿，占世界人口比例分别降至 12.5%、5.2%，65+岁老人比例分别增至 31.8%、48.6%。如果 2018 年的生育率为 1.1，那么出生 1080 万人，死亡 1158 万人，负增长 78 万人。

在第一套（官方）人口结构下，采纳滞后台湾 17 年的死亡模式，2018 年的生育率为 1.05，那么出生 1031 万人，死亡 1081 万人，负增长 51 万人。如果今后的生育率稳定在 1.05，那么 2050 年、2100 年总人口分别降至 11.50 亿、4.54 亿，占世界人口比例分别降至 12.6%、5.1%，65+岁老人比例分别增至 33.5%、47.7%。即便 2018 年的生育率为 1.1，那么出生 1080 万人，死亡 1082 万人，人口也在 2018 年开始负增长（2 万人）。

在第二套（缩水）人口下结构下，采纳联合国的中国死亡模式，2018 年的生育率为 1.05，那么出生 941 万人，死亡 1038 万，负增长 97 万人。如果今后的生育率稳定在 1.05，那么 2050 年、2100 年总人口分别降至 10.42 亿、4.02 亿，占世界人口比例分别降至 11.6%、4.6%，65+岁老人比例分别增至 33.6%、48.8%。如果 2018 年的生育率为 1.1，那么出生 985 万人，死亡 1038 万人，负增长 53 万人。

在第二套（缩水）人口下结构下，采纳滞后台湾 17 年的死亡模式，2018 年的生育率为 1.05，那么出生 941 万人，死亡 971 万，负增长 30 万人。如果今后的生育率稳定在 1.05，那么 2050 年、2100 年总人口分别降至 10.55 亿、3.94 亿，占世界人口比例分别降至 11.7%、4.5%，65+岁老人比例分别增至 35.4%、48.0%。如果 2018 年的生育率为 1.1，那么出生 985 万人，死亡 971 万人，增长 14 万人，到 2019 年人口开始负增长。

中国人口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突破 3 亿，1949 年增至 5.4 亿。1949 年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6.0 以上，出生率为 36%，出生约 1930 万人。1950 年之前，属于传统农业社会，生育率长期维持在 6.0 以上，出生率应该与 1949 年类似，那么清朝中期的 1790 年，出生人口就已经突破了 1000 万。2018 年生育率只有 1.05 左右，只出生 940-1030 万人，只是 1949 年的一半，这是清朝中期以来最低的出生人数。

可见，2018 年是中国人口的历史性拐点，中国人口从此开始负增长，人口结构也快速老化，经济活力也将不断减弱，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历史性改变。一个在历史上长期占全球 1/3 左右人口的大民族，因为错误的人口政策，由于主流人口学家的短视和无能（学术腐败比经济腐败的危害更大），一步步沦落为极度老弱的小民族！

建议：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统筹制定反危机措施；成立国家人口智库体系，科学制定休养生息的政策。

（作者：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大国空巢》；苏 剑，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来源：爱思想网，2019 年 01 月 01 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厅)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卢继传

副 主 编：辛 梅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3366 59195293

010-66117652 57206299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责任编辑：孙正恩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